



陕西出版资金精品项目

陕西人文社会科学文库资助项目

秦岭碑刻经眼录

• 吴敏霞 党斌 高叶青 袁宪 著 •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

秦岭碑刻经眼录

吴敏霞 党斌 高叶青 袁宪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秦岭碑刻经眼录 / 吴敏霞等著. -- 西安 : 三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518-0706-7

I. ①秦… II. ①吴… III. ①秦岭—碑刻—汇编
IV. ①K87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32150号

秦岭碑刻经眼录

吴敏霞 党斌 高叶青 袁宪 著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刷 中煤地西安地图制印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34
字数 820千字
版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0706-7
定 价 126.00元

网 址 <http://www.sqcbss.com>

总 论

莽莽秦岭，横亘于中国内陆腹地，是我国自然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是黄河、长江水系的分水岭，也是中国的中央国家公园。广义的秦岭是指横亘于中国中部呈东西走向的一座山脉，西起甘肃临潭县北部的白石山，经天水南部的麦积山穿越陕西，东至河南的伏牛山，东西长约1600千米，南北宽100至200余千米，巍峨耸立，气势磅礴。狭义的秦岭是指大秦岭山脉的中段部分，即介于关中平原和汉水谷地之间的山脉，习惯上华阴以南称太华山，华县以南称少华山，长安以南称终南山，眉县以南称太白山，宝鸡以南称大散岭。这里曾经是中华传统历史文化的汇集地，现存历史文化遗迹不可胜数。作为历史文化重要载体的碑刻，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秦岭范围内存留下来的碑刻数量巨大，价值颇高。针对秦岭碑刻的调查、保护、开发、利用，以及对其地域特点与价值的考察与探究，既是相关学科如历史学、文学、宗教学等研究的需要，也是打造大秦岭文化品牌的一个迫切而重要的课题，兼具学术研究、文化传承、旅游开发等多重意义和价值。

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启动了编写《陕西金石文献汇集》大型丛书项目。作为省级“八五”、“九五”、“十五”古籍整理规划重点项目，先后出版了《秦代陶文》、《周原甲骨文综述》、《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秦封泥集》和《楼观台道教碑石》、《重阳宫道教碑石》、《华山碑石》、《榆林碑石》、《咸阳碑刻》、《户县碑刻》等。笔者有幸参与该项目，对秦岭碑刻的搜集与研究进行了长期的关注。2011年，笔者申报的“秦岭碑刻的田野调查与价值研究”课题，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立项批准号：11XZS014），课题组由此对秦岭碑刻展开了全方位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就秦岭碑刻的数量来看，在2011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时，据笔者掌握的数据，曾预计有2000余通；2011年项目立项后，通过半年多的田野调查，获得秦岭碑刻资料2500余通，超过了申报课题时的预计；至2012年9月国家项目中期检查时，课题组收集到的秦岭碑刻超过4000通，另有数百通历史上著录今已亡佚不存者。截至2012年12月初，经与全国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和可

移动文物普查的数据核对，以及进一步的田野调查，秦岭碑刻总数在5000余通以上。

所谓秦岭碑刻，不仅指现存于秦岭腹地、秦岭南北麓及西秦岭山体漫延部分的碑刻，而且出土或原立于秦岭今存藏于其他地方的有关碑刻，亦在考察之列；同时，通过翻阅历史资料，包括正史、杂史、野史、笔记、志书、金石文献等记载，历史上的秦岭碑刻佚碑存拓、佚碑存文、佚碑存名者，也包含其中。本书所涉的秦岭碑刻，以陕西境内秦岭南北麓现存碑刻为主体，旁涉甘肃、河南相关县区所存碑刻。

经初步田野调查，从目前已经取得的数据来看，秦岭南北麓包括西秦岭，现存与历史记载的碑刻有5000余通。时间跨度上，上迄先秦时期，下止民国末年，共计2600余年。按历史朝代来分，先秦两汉时期的有21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有63通，隋唐五代时期的有440通，宋金元时期的有257通，明代的有462通，清代的有3181通，民国时期的有495通，民国之前年代不详的有177通。延绵的秦岭，特别是秦岭腹地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积淀。秦岭见证了商周的文明、春秋战国的角力纷争、秦汉时期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巩固、魏晋南北朝频繁的朝代更替、隋唐两代帝国的强盛繁荣、宋元明清数百年间的民族文化融合以及民国年间的动荡岁月。秦岭碑刻正是数千年中华文明重要的实物见证。

秦岭碑刻的地域分布，涉及到的行政区划包括甘肃、陕西、河南3省30余市县区。在甘、陕、豫三省所涉各市县区，碑刻多有相对集中且主题鲜明的分布点，如天水玉泉观和伏羲庙、留坝张良庙、勉县武侯祠及武侯墓、略阳灵崖寺、洋县智果寺、城固五门堰、旬阳文庙、周至楼观台、户县重阳宫、户县草堂寺、长安区博物馆、临潼华清池、华山西岳庙等。此外，仍有大量的碑石分布在广阔的秦岭山脉之间。从目前考察的情况看，秦岭碑刻的地域分布，表现为相对集中与广泛分布结合的特点。这样的分布特点，一方面与秦岭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秦岭东西跨度极大，这就直接决定了其碑刻分布的广泛性；另一方面，碑刻本身就是文化的载体，地域性的文化在碑刻上的体现，表现了碑刻的区域文化特征。所以，各地都会出现相对集中的碑刻文化单元。

根据《金石录》、《关中金石记》、《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雍州金石记》、《地理通释》以及各类地方志文献记载，秦岭碑刻在历代皆有流失。如：南北朝时期王褒所撰的《温汤铭》，原碑早佚，现仅存其文；刻立于隋大业二年（606）的《唐高祖为子祈疾疏》，原碑及元朝重刻碑皆已亡佚；原存于陕西临潼骊山行台大门外的《大隋残碑》，清咸丰年间仅存其半，光绪年间佚失；原存甘肃天水卦台山的隋大业六年（610）《伏生墓志铭》，民国时期移至天水东学署存放，今佚；陕西周至楼观台所藏欧阳询撰并书的《大唐宗圣观记》实为元代重刻，唐武德九年（626）之碑早佚；陕西眉县的唐《柳宗元祷雨碑记》在南宋年

间就已不存；原存陕西户县甘峪口遇仙观元朝初年刻立的《重阳宫下院遇仙观碑》，今碑不存；宋《苏轼洋州三十景诗碑》于清中期流失；元至元三十年（1293）《终南山集仙观记碑》原藏户县，今佚。年代较近的碑刻也有流失，如河南灵宝清光绪年间的《创修三侯祠记》、《宏阳渠碑记》等有关当地民俗文化、水利制度等方面的碑刻，现亦不存。

二

秦岭碑刻，根据形制可分为五大类：

第一类为碑。竖立于地上，刻有文字的称为碑。完整者有碑首、碑身、碑座。碑又分为卧碑、竖碑。卧碑如陕西华阴西岳庙存藏的《乾隆卧碑》、户县文庙存藏的《敕旨榜文卧碑》、城固杨侯禅院存藏的《重修杨侯院碑》等。竖碑有公文碑，如原立于陕西户县庞光乡化羊庙正殿前院今藏于户县文庙的《蒙汉文合刻令旨碑》、户县重阳宫存藏的《褒封五祖七真制辞碑》、户县草堂寺存藏的《阔端皇太子令旨碑》、华阴西岳庙存藏的《忽必烈敕光宅真人董若冲圣旨碑》、勉县二道河乡存藏的《圣谕碑》、周至楼观台存藏的《宗圣宫设五品提点所公文碑》、华阴西岳庙存藏的《诏示岳镇海渎碑》、城固五门堰存藏的《敕谕儒学碑》、户县文庙存藏的《御制训饬士子文碑》、太白王家堎乡存藏的《督宪牌示碑》、甘肃徽县存藏的《永革十大害碑》等。有乡规民约碑，如陕西勉县勉阳镇存藏的《刘旗营贾旗寨村规碑》、安康存藏的《双溪寺新立禅林规约碑》、汉中洋县四郎乡存藏清嘉庆十五年（1810）刻立的《观音堂过事宰猪碑记》、户县沣峪口净业寺存藏清道光十二年（1832）刻立的《净业寺置田地并立规约碑记》、汉中城固双井村存藏清道光十八年（1838）刻立的《双井乡规碑》、安康宁陕皇冠镇存藏清同治三年（1864）刻立的《公和兴会公会议条规碑》、汉中勉县勉阳镇存藏民国二十九年（1940）刻立的《陕西省沔县旧州河西堰堰产及堰规记》、汉中城固洞阳宫存藏清道光九年（1829）刻立的《洞阳宫山场条规碑》等。有记事碑，如长安杜公祠存藏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刻立的《创建唐杜子美先生祠堂记》、户县庞光乡化羊庙存藏明景泰三年（1452）刻立的《重修东岳庙记》、临潼华清池存藏明成化十五年（1479）刻立的《华清宫建雷神殿碑记》、宝鸡眉县张子祠存藏明万历三十六年（1606）刻立的《重修张子祠碑》、宝鸡太白嘴头镇存藏清嘉庆十五年（1810）刻立的《重修秦岭山神庙碑》、安康石泉县后柳镇存藏清嘉庆十六年（1811）刻立的《黑沟河修路碑》、户县草堂镇存藏清嘉庆十七年（1812）刻立的《公建义学碑记》、秦岭沣峪口净业寺存藏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刻立的《重修净业寺碑记》、户县石井乡存藏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刻立的《新兴寺碑记》等。有告示碑，如汉中洋县桑溪乡存藏清同治六年（1867）

刻立的《告示碑》和同年旬阳县蜀河镇存藏《知县告示碑》、汉中洋县华阳镇存藏清嘉庆十七年（1812）刻立的《华阳营士兵福利告示碑》、凤县安河寺存藏清道光十六年（1836）刻立的《裁决告示碑》、安康宁陕柴家关乡存藏清光绪二十年（1894）刻立的《宁陕抚民公府豁免驱兽枪税告示》、安康旬阳县泰山庙存藏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刻立的《北路兰草坪铺刊禁赌碑》等。有契约碑，如汉中洋县华阳镇存藏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立的《公帮议举条规碑》、宝鸡太白桃川镇存藏清道光十一年（1831）刻立的《公议公认遗粮碑记》、安康旬阳县仙河乡存藏清光绪十七年（1891）刻立的《卖地文契碑》、安康石泉县饶峰镇存藏清光绪十八年（1892）刻立的《徐文斗卖房田地文契碑》等。有墓碑，如原立于安康张滩汪家岭今存安康博物馆宋淳熙五年（1178）刻立的《安康郡侯任天锡墓碑》、汉中略阳存藏明崇祯六年（1633）刻立的《刘继先墓碑》、户县王丰川墓前存藏清乾隆五年（1740）刻立的《王丰川墓碑》、安康宁陕存藏清嘉庆三年（1798）刻立的《杨应瑚墓碑》、汉中城固张骞墓前竖立的清光绪五年（1879）《张骞墓碑》、商洛柞水存藏民国十一年（1922）刻立的《吴景贵墓碑》等。有神道碑，如渭南临渭区白居易族墓存藏唐咸通三年（862）刻立的《白敏中神道碑》、原竖汉中勉县张氏祖茔现藏勉县文管所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刻立的《张武南神道碑》、安康旬阳甘溪镇存藏清宣统三年（1911）刻立的《钟侍郎神道碑》等。有传记碑，如原立长安华严寺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唐大中六年（852）刻立的《杜顺和尚行记碑》、华县存藏明隆庆元年（1567）刻立的《郭子仪碑》、华阴革命公墓存藏民国四年（1915）刻立的《姜思医士纪念碑》、原立户县庞光镇史德性烈士墓前现藏户县文庙民国八年（1919）刻立的《史德性烈士传碑》、户县秦渡镇存藏民国二十二年（1933）刻立的《郭仰山世行传略》等。

第二类为碣。镶嵌于墙体上的矩形或方形，刻有文字的称为碣。如宝鸡陈仓区存藏北宋元祐年间刻立的《吴子平行记碣》，汉中略面白水江镇铁佛寺存藏明正德十三年（1518）刻立的《铁佛寺宝塔碣》，渭南临渭区存藏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刻立的《庆安寺重修宝塔碣》，汉中洋县庙垭村存藏清光绪十二年（1886）刻立的《文昌至圣神会碑记碣》，汉中略阳徐家坪镇存藏清乾隆三十年（1765）刻立的《清溪小引碣》，宝鸡太白嘴头镇存藏清道光十一年（1831）刻立的《献黑龙江碣》，镶嵌于汉中勉县鸡头关道观内清代至民国30余方碣，有《佑安行人》、《感而遂通》、《一路平安》、《如斯响应》、《辅汉遗风》、《有求必应》等内容，长安圣寿寺存藏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刻立的《观音大士伏龙赋碣》，镶嵌于汉中洋县长溪乡文昌庙正殿山墙上清光绪十二年（1886）刻立的《文昌至圣神会碑记碣》，汉中勉县马超墓墙壁镶嵌清嘉庆六年（1801）刻立的《谒马超墓碣》等。

第三类为墓志。埋葬于地下，与墓主同室而置，主要记载墓主生平、事迹、籍贯、族系、职官、妻、子、葬地等内容的称为墓志。放置于塔下或镶嵌于塔外，记载塔主生平、事迹、道行等内容的称为塔铭，亦为墓志之一种。如出土于渭南华阴五方村的北魏杨氏家族杨颖等数方墓志，出土于长安大兆乡的北周明帝二年（558）北周皇族《拓拔育墓志》，出土于长安郭杜镇的隋开皇十二年（592）《吕思礼墓志》，出土于秦岭天子峪口百塔寺的唐显庆二年（657）《光明寺慧了法师塔铭》，神禾原香积寺存藏唐开元十二年（724）刻立的《净业法师灵塔铭》，少陵原兴教寺存藏唐开成四年（839）刻立的《唐三藏玄奘塔铭》和《基公塔铭》，出土于长安韦区北原的唐神龙三年（707）《韦嗣宗墓志》，出土于户县甘亭镇的宋熙宁七年（1074）《马端墓志》，出土于长安航天基地的宋熙宁八年（1075）《范天祐墓志》，存藏于户县草堂寺的金元光二年（1223）《辨正大师塔铭》，出土于户县张良寨的元泰定四年（1327）《贺胜墓志》，出土于长安韦曲现藏西安碑林的元泰定三年（1326）《耶律世昌墓志》，出土于长安的明永乐十八年（1420）《唐玉真墓志》，出土于汉中略阳王家坪的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赵近臣墓志》，出土于渭南潼关县沙坡的清乾隆十二年（1747）《孙瑞翁墓志》，出土于户县宋村的清道光元年（1821）《杨子威墓志》，出土于渭南华阴县的民国十四年（1925）《胡励生墓志》，出土于蓝田县三里镇的民国二十九年（1940）《杨仁天墓志》等。

第四类为造像题记。发愿人于造像碑身题记留名，记载造像缘由及造像人发愿文为造像题记。如出土于蓝田汤峪乡的西魏大统十四年（548）《张海珍四面造像题记》，华县金惠乡存藏的北魏《朱墨奴造像题记》，原竖户县甘河镇现藏户县文庙的北周大象二年（580）《北周造像题记》，原竖汉中城固青龙寺现藏城固文化馆的南北朝时期《石黑奴造像题记》，宝鸡太白嘴头镇存藏的唐天宝元年（742）《丰某造像题记》，汉中略阳灵崖寺存藏的清嘉庆十四年（1809）《塑修大佛像题记》，安康石泉县两河镇存藏的民国三年（1914）《川主庙增修神像题记》等。

第五类为摩崖。就山崖方便之处刻字留存者称为摩崖刻石。汉中石门是古代褒斜道上的一个隧道，在隧道东西两壁和洞外山崖绝壁上，刻有汉代以来历代官员文人的留诗与题名或记事题刻，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以汉代的《鄖君开通褒斜道》、《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和北魏的《石门铭》为代表的《石门十三品》等摩崖。与其《石门颂》相媲美的是西秦岭上的《西峡颂》和陕西略阳的《鄖阁颂》合称为“三峡颂”的摩崖。陕西凤县境内明代文岗题刻的“千流飞雪”等摩崖，陕西城固境内建基岩上“山阳春岗”等摩崖，陕西留坝境内的“紫柏留仙”等摩崖和“汉张留侯辟谷处”、“收秦关”、“成功不居”、“功业垂宇宙”等摩

崖，安康宁陕的“月亮滩”等摩崖，陕西太白县太白山上“老君洞”摩崖，陕西城固境内滴水崖“灵气成云”等摩崖，陕西安康宁陕境内油坊坪上“秦府牧羊山坡”等摩崖，少华山上“五言律诗”等摩崖，都是秦岭摩崖较为著名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岳华山，因其千百年来登临者络绎不绝，文人墨客以书寄情，题刻的摩崖刻石达200余处，如“云台峰”、“王猛台”、“中天积翠”、“华峰第一”、“一览众山小”、“天地奇观”、“天然变化”等摩崖，成为秦岭浑厚人文景致的代表者。

三

秦岭碑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民俗、宗教、人物等诸多方面，按照内容进行划分，大致有公私文书、乡规民约、兴修水利、保护森林、人物传记、佛道儒家经典、民俗历史等多个方面；按照文体，又可以划分为纂言、记事、述德、路标、诗文、艺术等六类。

（一）秦岭碑刻中数量较多者为纂言类碑刻。纂言或为撰述，韩愈《进学解》云：“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此类碑刻或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公文案牍碑，为各级政府颁布的公文碑刻。如陕西周至楼观台存藏的《宗圣宫设五品提点所公文碑》，是元朝针对各处宫观没有专门职官管辖，致使钱粮物品多少无从查考，批准于奉元路大重阳万寿宫等处宫观设立提点所，行使官方簿书权，特刻石予以颁布。陕西户县重阳宫存藏的《大蒙古国累朝崇道恩命之碑》，是多道蒙古国诏书碑刻，第一、二封诏书讲述成吉思汗建国立业之不易和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礼贤下士、尊崇道教，邀请丘处机传道等事迹；其中有四道圣旨是免去道教差发赋税、授权丘处机管理天下道教事务，有关道士婚姻及饮食，令清和真人尹志平等挑选德行清高之道人向皇帝讲道论经等；两封令旨一是阔端太子令相关官员保护重阳万寿宫，一是弥里呆带太子允准重阳宫建玉皇楼观等处宫观，并令当地官员保证宫观安全等。陕西城固五门堰存藏的《敕谕儒学碑》，是明神宗敕谕地方办学的碑刻，共计十六条，对违纪学生以及对教师与各级官吏在入学、考试、举贤、请封等方面徇私舞弊者，均有处分的规定。陕西洋县智果寺存藏的《智果寺圣谕碑》，分敕谕碑、御制圣母印施佛藏经序和申时行所撰的圣母印施佛藏经赞有序三部分，记载明万历皇帝敕谕智果寺住持及僧众人等，将圣母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颁布给本寺佛教藏经四十一函，“务须庄严持诵，遵奉珍藏”，“以垂永久”，以及申时行奉敕撰写的颂扬皇帝皇太后盛德的赞序。

二是乡规民约碑，为民众自发议定的规约碑刻。有陕西洋县上溢水村存藏的《乡规民约碑》，记载上溢水村村民共议的乡约十条，包括禁止聚众赌博、不孝不悌、酗酒闹事、奸

淫邪盗、自私自利、欺压善士等。洋县智果寺存藏的《智果寺成立保甲联防碑》，是智果寺合乡公议的抗击盗贼条款碑刻，详为智果寺前社后社暨黄郑二村白庙村绅耆老民乡地人等，共立之约：“倘一家被窃赶贼，比邻齐出帮赶；即不幸而有不测之患，其费用多少，亦合乡公议，随其事之轻重，酌量摊派”等。陕西宁陕梅子乡存藏的《契约碑》，记载道光十六年置买石姓田地的四至范围，田地收获的分配情况以及中证人姓名、工匠和代笔人姓名，是买卖双方订立的一份民间契约书。陕西凤县双石铺乡存藏的《买卖土地契约碑》，碑两面刻有三份买卖土地契约，内容详细记载土地交易的过程、四至和地价、税银，以及地媒人、中见人、户族见证人等，亦是一份民间契约书。

三是告示碑，为政府或乡里或社会贤达就某事发布的告示碑刻。有陕西太白县王家堎乡藏的《除弊安民告示碑》，是清政府明令地方官吏体察“地瘠民贫”的现状，革除军营“官索夫马价，兵索口岸钱”的积弊，并告示地方官吏要“永除积弊，严禁需索，而安地方”等。陕西城固县桔园镇存藏的《禁止赌博碑记》、甘肃两当县广香苑存藏的《禁赌博碑》，都是官府明令禁止聚众赌博，伤风败俗，违者严加治罪，决不姑息的告示。陕西宁陕筒车湾镇存藏的《禁止淘金告示碑》，为汉中镇宁陕营参府发布的命令，禁止乡民淘金，以免妨碍驻军营地、道路之事。陕西太白嘴头镇的《正风规事碑》，记述招垦里六甲为整顿集市贸易秩序，特公议订立条规，规定今后粮食买卖不得随意定价，乡民杀猪卖肉缴纳100文管理费用，牛马上市买卖双方直接交易等。

四是诉讼碑，为某事诉讼结果的碑刻。如陕西户县草堂镇大园寺存藏的《争山讼碑》，记载西安府申金柳、觉祥等人互控争夺山地详由，经勘查了解取得证据，断案双方拥有地亩四至，以永息讼端。陕西渭南临渭区崇凝乡存藏的《崇凝碑》，记载渭南县正韩氏奉陕西提刑按察使司礼尚书川陕总督席氏批据，处理本邑孙士僎于尹村“纠合乡愚，私立集场，把持行市”引起纠纷一案，判决孙士僎“枷号一月，责三十杖”，并取缔尹村集场一事。陕西华县金惠乡存藏的《公断渠水碑》，记载了华县雷家村与支家村用水纠纷及县府断案经过。原藏陕西勉县泉水堰现藏张鲁女墓亭内的《处理泉水堰纠纷碑》，记载汉中小中坝泉水堰历年用水纠纷，及官府断案平息争斗，用水双方私下协议和平解决用水问题等。

五是制诰碑，为皇帝为某事某人所作的嘉许或诰命碑刻。如现藏于陕西户县文庙的《御制训饬士子文碑》，是康熙皇帝亲自撰文书丹的敕谕碑刻，要求学子们要“先立品行”、“朝夕诵读”、“躬修实践”、“敦孝顺以事亲，秉忠贞以立志”、“穷经考义”、“取友亲师”等。陕西户县祖庵镇存藏的《诰赠王元正碑》，是明隆庆元年正月初七日，朝廷对原任翰林院检讨赠奉议大夫光禄寺少卿王元正的诰命碑刻。碑文记载王元正因“刚直抗疏”被



流放，死后颁发诰命，以使其“正气长存”，“宠光永贲”。陕西户县白庙村王家坟存藏的《敕命碑》，刊刻了明朝廷敕赠故城公为文林郎制命、敕赠徐氏为孺人制命、敕赠管氏为孺人制命。现藏陕西临潼博物馆的《诰封怀远将军双鹤张公碑》，为明万历皇帝诰封太监张恩父为怀远将军的诰命。

六是歌颂碑，为对某物某事的赞颂碑刻。如原立华山西岳庙现藏西安碑林的《述圣颂碑》，记载祭祀华山及西岳庙的历史，并大加赞颂当时统治者的丰功伟绩。陕西西乡金洋堰存藏的《邑侯刘父母重修金洋堰颂德碑》，记载金洋堰于当地老百姓的诸多便利与实惠，歌颂了时任县令的刘灼带领父老乡亲不顾烈日炎炎重修金洋堰的业绩。陕西临潼华清池御汤博物馆存藏北魏元苌撰《温泉颂碑》，就是颂扬临潼华清池温泉的碑刻，碑记此温泉“乃自然之经方，天地之元医。出于河渭之南，泄于骊山之下”，故“千城万国之民，怀疾枕疴之客，莫不宿粮而来宾，疗苦于斯水”，告诉人们此温泉乃自然形成，具有疗疾治病之功效。原藏陕西城固蜡神庙现藏五门堰的《创建蜡神庙里民颂德碑记》，颂扬了城固县令王邦光“补葺圣庙”、“建立两学衙署”、“重修养济院”、“置义冢”等丰功伟绩。

七是劝诫碑，为政府、官员或某人反对或提倡某事某物的劝诫碑刻。如陕西洋县博物馆存藏的《劝农文碑》，就是时任洋州军州事的宋莘撰文并刻石，主要叙述了洋州当时的农业状况，包括房前屋后植树建厕以防疾病，改善环境；农田须深耕细作、施肥灌水以及改进农器具，以提高产量；农户实施井田之法，互相帮助，和谐相处等。镶嵌在陕西户县大观楼的《格言敬劝碑》，苦口婆心敬劝人们“能忍者为贵，能和者为福”。陕西城固羊吼禅院存藏的《羊吼院警戒碑》，记载王姓某人盗窃羊吼院树木，被严加处罚，因立此碑予以警戒众人。陕西略阳灵崖寺存藏的《济世良方碑》，教导人们“发现良心，提倡道德，化除意气，开诚布公，不争权利，守本分，营正业，革除一切奢侈行为”，“实心向善，以身作则”等。

八是奏疏碑，为官员上奏皇帝的奏疏碑刻。如华山西岳庙存藏的《恳圣颁匾碑》，就是清代陕西巡抚毕沅向乾隆皇上的一道奏疏碑刻，毕沅恳请乾隆皇帝为华山题字，希望华山神灵有求必应，乾隆皇帝览奏后为华山题“岳莲灵澍”四字，毕沅率文武僚属出郊跪迎等。陕西户县草堂寺存藏的《印公开堂疏碑》，为陕西东路京兆府谨请印公堂头作本寺山住持，为国开堂祝延圣寿所上的奏疏，认为草堂寺乃“宇宙福田，本罗什译经之场，实定慧谈空之境”，不可使“曹溪千载衣钵”，后继乏人，故上疏谨请任命印公为本寺住持，弘传佛法。陕西周至楼观台存藏约金代晚期的《祝延圣寿疏》碑拓，为道教全真教栖霞长春子丘真人上疏朝廷，“伏愿当今皇帝永寿齐天，四时协律无灾，万国倾心顺化，乃至邪风不起，道

教长兴”的奏疏。

(二) 秦岭碑刻中最多的为记事类碑刻。记事或作叙事留存，以飨后世。此类或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记叙寺庙道观学堂营署等建筑、道路桥梁等设施创建和重修碑刻。陕西略阳白水江镇小河村青崖湾组与甘肃徽县大河乡瓦泉村高家山组交界处，有北宋嘉祐二年（1055）刻立的《新开白水路记》摩崖题刻，记载时任利州路主客郎中的李虞卿，以秦蜀要道青泥岭旧路高峻险拔，泥泞难行，特自凤州（今凤县）河池驿至兴州（今略阳）长举驿，新修五十里余长的白水路以便公私之行的修路历程。陕西洋县存藏的《统制李侯重建州治记碑》，记载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金军攻陷洋州，州、郡治尽遭焚毁，知州李信甫抚恤安民、修葺州城，以及绍定四年（1231）蒙古军屠洋州、焚州治，次年军统制权知洋州李显忠重建州治的情况。甘肃天水伏羲庙存藏的《重修伏羲庙记碑》，是明代前七子之一的康海撰文、陕西按察司佥事张憲书丹、陕西布政司左参政任洛篆额，记载重修伏羲庙有关事宜的记事碑。华山青柯坪存藏的《创建茶房碑记》，记因华山上“善士愈多，信女益众，且男女有别，宜异处而难于同居焉”，于是在华山青柯坪修建茶房，专供女香客会聚居住之事。陕西洋县桑溪乡存藏的《修建万善桥碑》，主要记述了子午河源于秦岭，西乡、洋县两邑群众往来不便，众人捐资修建万善桥以便民众等事宜。甘肃徽县文化馆存藏的《大河店修路碑》，记录了自宋新开白水路，经元、明、清三代白水路之兴废、变迁情况，反映了秦陇人民开辟古蜀道，沟通秦、陇、蜀三地，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史实。

二是记叙兴修水利改良农田碑。如陕西户县重阳宫存藏的《栖云王真人开涝水记碑》，记载栖云王真人率众凿渠引终南涝谷之水绕重阳宫，又绵延二十余里，普惠大众，使周边村镇潇然有江乡风景的事。陕西周至二曲镇存藏的《改良农田碑》，记周至县官员倡导乡民开垦荒地，并改旱田为水田，发展农业经济的措施等事。陕西户县草堂寺存藏的《逍遥栖禅寺新修水磨记》，记载逍遥禅寺修建水磨的缘由、地点及修建经过，水磨的修建，使“九夏绝于炎殃，则可滋于稼穡；一方溉于畦陇，则挹之弗穷”，既方便了民众日常生活之需，又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保障。陕西周至九峰乡存藏的《白马河水道碑记》，介绍了白马河及其附近的地理位置及地形，记载周至县令刘公下令修堤治水的事件经过。

三是某姓某族的宗祠碑刻。如陕西周至仓峪村存藏的《创修宗祠碑》，记载邓家后代因此地幽静雅观，为纪念祖先迁移之功，创建宗祠一座，及宗祠的四至、庙产等。陕西洋县时家坡村存藏的《创修祠堂碑》，记述了时氏家族从华阴县始迁至周至，再迁至洋县的历史，创修时氏祠堂的经过等。现藏于华山西岳庙的《华阴王氏家庙碑》，是清代华阴大学者号称

“关中声气之领袖”王弘撰家族的碑刻，较为详细地记载了王氏家族的渊源及其名讳职官身份。陕西城固三合乡存藏的《合修祖庙碑》，记载胡氏在明代成化年间由湖北迁入此地的历史，创修宗祠的经过等。陕西城固沙河营乡存藏的《创建祖祠碑》，讲述了刘家曾祖及儿孙的苦难生活和修建刘家祠堂的情况，包括位置、祠堂规模布局、祖祠田地等。

四是记事件经过或自然环境碑刻。陕西略阳灵岩寺的《顺政郡药水窟述记》摩崖题刻，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时称药水窟今为灵岩寺的旖旎风光和美景。陕西户县白庙乡望仙坪存藏的《望仙坪碑》，是记载望仙坪名称由来及其景致的碑刻，文曰：“聂姑羽化于此，故名仙；其亲思之，至止山下而相仰，故名望。”“所谓坪者，坦坦荡荡，沃壤数顷。”“望仙坪孑然挺对于天地，岂非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名则能久乎！形胜若此，真可与华岳、骊山、曲江、雁塔、灞柳、咸阳、草堂、太白并称关中之景。”陕西城固五门堰存藏的《唐公车湊水利碑》，详细地记载车湊水利事件首发人及历汉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变化等。陕西汉中天台山存藏的《天台胜迹汇志碑》，记述了天台山“其脉远接秦岭，迤逦终南，山峰俊秀，林木苍翠，为陕南第一名山”，分述天台山“诸葛故堡”、“石堰交流”、“呼吸奇泉”、“飞仙灵崖”、“太极神图”等十八处胜迹。

五是游记碑。如陕西略阳灵崖寺存藏的《游灵崖记碑》，就是李仰游历灵岩寺的一方游记碑刻，碑记“至灵崖，石室突兀托青霄”，“至罗汉洞，天柱石梁根若虬龙盘曲”，“拂石读蔡中郎刻字迹，千古有生动之色”，于是“洗盏更酌……致席灵崖，洒然有尘外之想焉”，古人陶醉青山绿水尽享人间美景的一幅画面跃然纸上。现藏西安碑林的《华山记碑》，为一华山游记，文记：“城南八里许至云台观，过小溪，抵玉泉院，拜陈图南卧像。进谷口……约五里许，有巨石塞入谷口，开一门，为第一关。”如此记载第二关、青柯坪、回心石、千尺幢、百尺峡、二仙桥、岭脊等，精彩地描绘了华山的美丽风景及沿途景观。华山西岳庙存藏的《太华山记》碑刻，记述了华山的总体面貌及沿途的自然风光，亦是一通游记性质的碑刻。

（三）秦岭碑刻中第三大类为述德类碑。述德即称颂功德，多为后人或后代对著名历史人物或先祖功德的称颂，刊刻于石即为述德碑。秦岭碑刻中的述德类碑有以下几种：

一是墓志铭。与逝者同室而置埋葬于地下，记载墓主生平、事迹、籍贯、族系、职官、妻、子、葬地等内容的称为墓志。记载僧（道）人事迹之塔铭，亦是墓志之一种。如出土于陕西华阴的一批北魏杨氏墓志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弘农杨氏的族系源流及各个墓主人物的生平事迹。原在秦岭天子峪口百塔寺现藏西安碑林的《法藏禅师塔铭》，记载法藏禅师俗姓诸葛，苏州吴县人，其曾祖、祖、父，历任官于北周、隋、唐，详细介绍了禅师出家经过、

历任住持、圆寂时日、安葬地域等，并颂扬其寂行冲融、禅行高远等道行。陕西城固出土现藏五门堰的《杨从仪墓志铭》，记载南宋抗金爱国将领杨从仪的籍贯族系、名讳生平，以及其屡次出击抗击金国来犯之敌的英勇事迹，并记杨公乞休后尽心修复当地水利设施，推行营田提高产量，歌颂杨公礼贤下士、勤奋治学、英勇善战等优良品德。陕西周至楼观台说经台存藏的《终南山楼观宗圣宫提点成公先生墓志》，记述了终南山楼观宗圣宫提点成志远的家世、出家修道经过及对光大道教所作的贡献。出土于华山胡公祠的《胡景翼墓志铭》，近代大书法家于右任撰文并书丹，详细记载了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的名讳籍贯，参加革命军的前后经过，任职升迁情况，参加战斗情况，赞扬了胡景翼豁达大度、爱兵如子的为人处世风度。

二是神道碑。神道即墓道，神道碑是指神道前的石碑，上面记载死者生前事迹等。如陕西城固龙头镇存藏的《曾老夫子神道碑》，介绍了曾老夫子的从教经历和主要业绩，赞颂了曾老夫子为教育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陕西渭南临渭区信义乡存藏的《焦相栋神道碑》，记载赏戴花翎户部湖南司员外郎加六级焦君的家族谱系、生平、历官等。陕西城固天明镇存藏的《刘三才神道碑》，记载邑庠生武略骑尉刘三才的生平及功业。陕西渭南临渭区出土现藏西安碑林的《白敏中神道碑》，记载了白敏中长庆初年进士及第，武宗时迁户部兵部侍郎，宣宗时入朝，历六朝，握国柄，多所建树等。陕西城固水磨镇存藏的《鲜绍纲神道碑》，记载鲜姓姓氏来历和鲜姓先主由川迁汉而后定居的由来，以及鲜绍纲的生平事迹。

三是德（道）行碑。如陕西周至楼观台宗圣宫存藏的《尹宗师道行碑》，记载尹宗师名讳、籍贯、生平事迹及道行、封赐等。陕西户县重阳宫存藏的《皇元孙真人道行碑》，记述了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领重阳宫事孙德彧的生平、出家修行经过、师承关系及其道行和封赐孙真人等。陕西勉县褒城镇存藏的《熊廷俊德教碑》，褒扬了邑庠增广生熊廷俊的学行品德。陕西旬阳县石佛寺存藏的《石佛寺道长功果碑记》，记载石佛寺柯道长和管道长二位修建石佛寺的功德，颂扬了二位道长救济贫弱的事迹。

四是传记碑。如陕西宝鸡陈仓区磻溪宫存藏的《全真第五代宗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碑，详细记载了全真教第五代宗师丘处机的生平事迹，是一通个人传记性质的碑刻。发现于陕西长安鸣犊镇现藏于西安碑林的《皇甫诞碑》，记述了皇甫诞的名讳字号、祖籍祖先，及在隋为官的经历、获得的荣誉等，于志宁撰文，欧阳询书丹，故世称“三绝碑”。陕西户县重阳宫存藏蒙古至元十二年（1275）刻立的《全真教祖碑》，记载全真教祖王重阳的生平、道行、封赐等。原立于终南山天子峪现藏西安碑林的《智该禅师碑》，在叙述了隋唐之际佛教发展情况的同时，主要记载智该禅师的生平事迹和禅行。陕西周至楼观台宗圣宫存

藏的《楼观先师传碑》，文分上下七段，第一段刻“文始真人”传，第二至第六段每段各刻六位真人传，第七段刻四位真人传，共刻有35位真人传，各传中上部条形框内隶书真人姓名。分别记述了元至元三十年以前楼观历代继任人包括文始真人尹喜、太和真人尹轨、太极真人杜冲、赤城真人彭宗、太清真人宋伦等真人的生平事迹与道行，是一通汇总性质的传记碑刻。现藏于陕西城固五门堰文保所的《祖师田真人传碑》，记载了田真人姓氏名讳、生平事迹、得道师承及生卒年月等。

五是墓碑。如陕西留坝张良庙西北二里方丈坟的《潘一良方丈墓碑》，采用一字顶真回文诗形式，介绍方丈自河南来此紫柏山修炼成道，年八十撒手人寰等生平事迹。原镶嵌于陕西长安太乙镇义安院现藏樊村乡道安国师寺金兴定二年（1218）刻立的《苻秦国师和尚塔碑记》，记述了东晋僧人苻秦国师道安和尚的生平事迹及其佛学经历，赞扬了道安弘扬佛法的精神。陕西城固古路坝教堂的《圣伯多禄保禄会司铎瑞公良大人墓碑》，记载了古路坝教堂司铎瑞公良的生平及传教事迹。西安康市博物馆存藏的《安康郡侯任天锡墓碑》，记载了南宋抗金名将任天锡的生平事迹，可补《宋史》之阙。陕西佛坪长角坝镇存藏的《田礼和墓碑》，记载田礼和自沂州大同迁入此地安居的经历，以及生平事迹和品行。陕西丹凤北赵川乡存藏的《陈永万墓碑》，记载陈氏自江南太湖县金华乡于乾隆二十年迁来商洛五关河，创业立家之事，及墓主生平事迹等。

（四）秦岭碑刻中第四大类为路标类碑刻。这是秦岭碑刻中特有的一类。在秦岭中，深山老林道路迷幻，人进入如入无路之境，方位无法辨识，道路无从寻找，极易迷路。在这种情况下，路标类指路碑的竖立，就为人们出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陕西城固董家营乡存藏清代刻立的《指路碑》，内容记述“东从庙后走孙家坪六十里，南走天明寺三十里，北走城固三十里，西过沙河走汉中府五十里”，额书“指路碑”三字，供经过此地的人们辨识路径。陕西洋县寨沟梨树垭存藏的《指路碑》，内容为“东走新铺五十里，西走桑园四十里，南走西乡五十里，北走龙亭铺四十里”，较为准确的说明了此处的具体地理位置，为行至此处的人们提供了方便。竖立于陕西凤县南星镇连云寺村的《对面古陈仓道碑》，是由分巡陕西汉兴道兼管水利驿传事务丰吉立。据1988年文物普查，此碑对面分布古栈道遗址四处，标明此即连接陕川的古陈仓道，此碑的刻立，留下较为珍贵的历史遗迹和可资利用的研究资料。陕西长安引镇嘉午台山破山寺存藏的《破山寺山界碑》，标明破山寺在明代嘉靖年间的山界地段和具体的地理位置。竖立于陕西凤县南星镇高桥铺村南的《柴关岭碑》，是时任全国经济委员会筹备处道路股股长的赵祖康所题，标明此处地名的路碑。同样，陕西凤县双石铺镇酒奠梁顶民国二十五年（1936）刻立的《酒奠梁碑》，亦为赵祖康题，标明此处地名的路碑。

陕西略阳观音岩存藏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刻立的《路碑》，也是竖立的一通指路碑刻。在今陕西凤县黄牛铺镇存藏着一通清代的路标碑刻，中书“宝鸡县西南界”，标明了当时的宝鸡县西南界线所在。在今陕西略阳两河口镇张家坝村大路坎组观音岩上，刻有“路碑”的摩崖题刻，为人工在连山石上浅浮雕而成，花岗岩质，圆首，莲花底座，高1.20米，宽0.61米，碑额正中阴刻楷书“路碑”二字，又横排阴刻“神明鉴照”四字，碑文竖排阴刻楷书，是一通指路性质的摩崖题刻。又如陕西汉中石门著名的“石门”摩崖题刻，华山中“最高峰”、“玉女峰”、“朝阳台”、“迎阳洞”等，都是指路性质的摩崖题刻。

（五）秦岭碑刻中第五大类为宗教经文类碑刻。秦岭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汇聚地，更是道教文化的发源地，是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弘法场所和多个佛教宗派的祖庭，所以道教和佛教经典在这里以碑刻的形式多有展现。

佛教经典碑刻多为经幢，内容多为经咒。如现藏陕西长安区博物馆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陕西蓝田蓝关镇存藏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陕西临潼博物馆存藏的《尊胜陀罗尼经并序》和《佛说尊胜陀罗尼经序》、眉县政府院内存藏的《陀罗尼经幢》等，主要称颂赞扬陀罗尼的破地狱功能，并教授持诵此陀罗尼之法，以实现解脱，都是民间流行最广的佛教经典。现存陕西汉中市博物馆的《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又称《千手千眼观世音大悲心陀罗尼》、《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身咒》、《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大悲陀罗尼》等，讲述观世音菩萨的大慈悲心、无上菩提心，以及如何济世渡人、修道成佛的重要口诀。终南山净业寺存藏的《嘉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经幢》，称颂陀罗尼神咒是佛教大乘的一部殊胜经典，持诵者，能除一切恶道，能除一切罪障，永离一切恶病众苦。天水博物馆收藏五代时期刻立的《波罗蜜多经幢》，即《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般若经》、《金刚经》，是一部重要的佛教经典，后秦法师鸠摩罗什译，诵读者，可消灾、增福、增寿、度亡。长安牛头寺存藏的《八棱柱经幢》，分十部分：第一部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第二部分为“圣千手千眼观世音自在菩萨摩诃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真言”，第三部分为“阿閦如来根本灭恶趣陀罗尼”，第四部分为“净口业真言”，第五部分为“地藏菩萨破地狱真言”，第六部分为“普贤菩萨灭罪真言”，第七部分为“口解多生怨结真言”，第八部分为“文殊五髻真言”，第九部分为“吉祥真言”，第十部分为“佛顶尊胜大悲心及诸真言赞”，都是佛教修行的重要依据。

道教经典碑刻，如现存陕西周至楼观台和陕西宝鸡陈仓区磻溪宫的《道德经幢》，镌刻了道教首经《道德经》，又名《老子》、《老子五千文》，为道教元典，采用篆书和楷书的形式，刻碑昭示于天下。陕西户县祖庵成道宫存藏的《丹阳马真人十劝碑》，是道藏中的

《丹阳马真人语录》。从道教的立场规劝世人不得犯国法、尊敬长者、断绝酒色、日省己过、遇宠不惊、知恩必报、慎言节行、常守本分、互相帮助、随时修行等。陕西周至楼观台存藏的《玄元灵应碑》，记述玄元灵应之事，属道教经典。

（六）秦岭碑刻中第六大类为文学艺术类碑刻。大致有诗词、警句和书法碑刻等。

一是诗词碑。如陕西勉县武侯祠存藏的《琴吟自叙》诗碑，内容为诸葛亮感叹大汉刘氏政权的覆灭，激励自己为恢复大汉江山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陕西洋县博物馆存藏的《昌黎公洋川诗碑》，为颂扬古洋州之美景的诗词碑。陕西临潼华清池存藏的李挺撰《过临潼三绝句诗碑》、宋政和四年（1114）刻立的无名氏撰《过骊山作诗碑》和苏庄撰《留题灵泉观诗碑》，都是赞颂骊山之美景、温泉之绝伦的诗刻。陕西岐山五丈原诸葛亮庙存藏的《大复山人题刻》，为明代前七子之一的文学家何景明，为颂扬诸葛亮功绩所作的诗文。华山玉泉院存藏的《望华山登华山别华山诗碑》、《葛曦华山诗刻碑》和《葛守礼华山诗刻碑》，都是颂扬华山风景的诗词碑刻。现藏陕西留坝张良庙的《怀山歌碑》，是明代万历年间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借诗歌描述紫柏山青翠幽邃风景及感悟人生的碑刻。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的《林则徐游华山诗碑》，是林则徐虎门销烟后，被贬戍新疆伊犁，途经华山时所作并书，诗文颂扬了华山的浑厚雄伟与壮丽美景，其碑刻书法亦甚精湛。陕西户县文庙存藏的《甘亭十二景诗碑》，赞颂了户县十二处独特的美景，分别是中楼远眺、西郊花柳、绣沟春禊、渼陂泛舟、钓台花浪、玉蟾稻塍、紫阁青冥、重云雪巘、圭峰夜月、高冠瀑布、草堂烟雨、灵沼瑞莲。陕西洋县博物馆存藏的《洋州三十景诗碑》，洋县知县石珩书并刻石，分4段，每段24行，每行12至13字不等，上刻苏轼咏洋州城郊景物诗30首。

二是警句碑。如原存陕西华阴敷南村太白庙今藏西岳庙的《弃恶从善箴言警句碑》，警戒人们不要“轻秤小升”、“压良为贱”、“贪婪无厌”、“嗜酒悖乱”、“轻慢先灵”、“违逆上帝”、“损子堕胎”，否则“如是等罪，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责，乃殃及子孙”，再告诫人们“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其福……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又如甘肃徽县文化馆存藏的《程子言箴碑》，告诫人们发言必谨慎，“凡人所言，必求其合诸道理，准诸经传”。原立于陕西临潼县学现藏西安碑林的《程子四箴碑》，是宋代儒学大家程颐所撰视、听、言、动四箴警言碑刻。

三是书法碑。秦岭各类碑刻均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在一定意义上，秦岭所有碑刻均可称为书法碑，现撮其要者略述一二。如陕西临潼华清池存藏的《乔元龙草书碑》，是一通出神入画的草书书法碑。华山西岳庙存藏的《华岳精享昭应之碑》，为唐代大理评事咸廙撰，唐代大书法家刘升隶书，有汉隶遗风。陕西长安存藏的《毕原露仙馆虚室记碑》，是隶